



论坛上，来自海内外的几十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回顾新中国早期外交的实践逻辑，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外交的历史脉络，为应对当前国际挑战、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重要启示。

两极格局下的生存抉择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全球已形成鲜明的两极对峙格局。美国凭借二战后的超强实力，推行“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将新中国视为“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还联合西方盟友对中国实施政治孤立、经济封锁与军事包围——在东亚，美国扶持日本、韩国构建“反共防线”，并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将中国列为重点禁运对象，阻断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济往来。与此同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虽对新中国表示支持，但其“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明显，试图将中国纳入苏联主导的阵营体系，在援助中附带政治条件。

面对“夹在美苏之间”的生存困境，新中国作出“一边倒”的外交抉择，即坚定站在社会主



上图：1954 年 4 月 26 日到 7 月 21 日，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国政府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正数第三排右三）出席了会议。

义阵营一边。1950 年 2 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与工业建设支持（后续落实 156 个工业项目），为新中国打破西方封锁、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关键支撑。

多位参会专家纷纷表示，这一决策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选择，而是基于当时现实安全与发展需求的理性判断——通过与苏联结盟，新中国有效缓解了美国的战略压力，为东北工业基地（新中国初期工业核心区域）争取到安全缓冲，同时获得了工业化起步必需的技术、设备与资金。

但“一边倒”绝不意味着放弃主权独立。新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始终坚守“不被大国操控”的底线。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1950—1953 年），苏联曾提出“联合指挥志愿军”“共管中国东北铁路”等要求，均被中国坚决拒绝；在战场战术决策上，中国始终坚持以志愿军为主体，苏联仅提供空中支援而非直接干预指挥。这种“既合作又独立”的态度，打破了传统阵营外交中“大国主导小国”的惯性，为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理念奠定了最初实践基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系教授马建标在“遏制冷战”的报告中特别强调：“新中国并非被动卷入冷战，而是主动以抗美援朝遏制冷战向亚洲蔓延。美国若占领朝鲜半岛，将形成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冷战的战